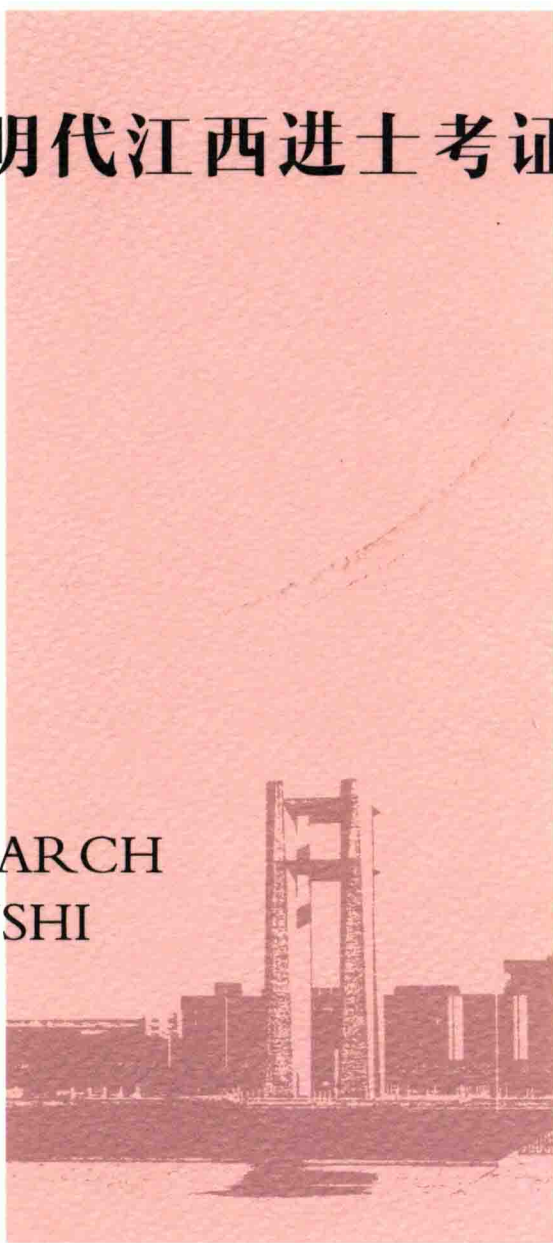


J I A N G X I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

# 明代江西进士考证

TEXTUAL RESEARCH  
ON JIANGXI JINSHI  
OF THE MING DYNASTY



邱进春  
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2691/1663

J I A N G X I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

# 明代江西进士考证

TEXTUAL RESEARCH  
ON JIANGXI JINSHI  
OF THE MING DYNASTY



邱进春  
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代江西进士考证 / 邱进春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5. 6

ISBN 978 - 7 - 5161 - 5224 - 9

I. ①明… II. ①邱… III. ①进士 - 研究 - 江西省 - 明代 IV. ①D69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7525 号

---

出版人 赵剑英  
责任编辑 宫京蕾  
特约编辑 李倩  
责任校对 李楠  
责任印制 何艳

---

出版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  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 
邮编 100720  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  
发行部 010 - 84083685  
门市部 010 - 84029450  
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---

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 
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 
印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  
印张 32.75  
插页 2  
字数 465 千字  
定价 85.00 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 - 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序

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行用了将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，戛然中止。

此后百余年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对科举制从开始偏激地声讨、冷静地反思，到现在全面、客观地进行研究，科举学形成一门显学，说明科举制的历史没有远离我们而去。这一曾牵动一千三百多年中国社会世道人心的制度，其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，对中国文化传统演进的影响，不是凭一纸废除的“诏令”就能终结的；相反，亟须我们走进科举制历史，深入地去研究、分析、吸纳、消化该制度的内容、生命力和影响力，取其精华，剔除糟粕，对其功过是非给出正确的评价，对该制度的进步性、合理性、公正性给予肯定、弘扬和借鉴，而其所存在的弊病与腐朽性，则给予揭发与批判。

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，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，选择了科举研究的学术方向，投身于中国科举史的研究。江西师大邱进春博士，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科举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，它涉及历史学、教育学、中国语言文学、考古学，文物、图书、档案、博物馆学、汉学等领域，不是哪一个学科能够包办得了科举史和科举学的研究。本书作者邱进春，是古代汉语专业硕士、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，他具备了从事中国古代科举史研究的学力和基础。《明代江西进士考证》，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科举史研究学术专著。

科举史研究，须是宏观的、中观的、微观的研究相结合，即总体概括千百年的科举史、断代的科举史和各个专题的科举制研究相结合；而这三者之研究，又离不开理论性的探讨与基础性的研究相结合。基础研究是一切科举研究的基础。基础研究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对科举文献的挖掘与整理；二是对历代登科人物的资料挖掘与整理。摸清历代登科人物的总数、掌握登科人物的传记资料，这是科举研究之基础的基础。如果将科举史研究比作一座大厦，那摸清历代登科人数及其主要的传记资料，就是大厦的基础。没有这个基础，科举研究就成了“空中楼阁”。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《中国历代登科总录》，做的正是这一基础性工作。

2003年，作者考进浙大古籍所古典文献专业，我成了他的博士生导师。经相商，确定了将攻博论文的撰写，与参加《中国历代登科总录》子课题《明代登科总录》结合起来。作者即以明代江西进士研究为题，投入了三年艰苦而深入的研究。《明代江西进士考证》这篇学位论文，便是他交出的一份优秀的研究成果。

不言而喻，本书是一项中观型的基础性研究。江西是科举大省，明代江西科举，继续保持宋代科举繁荣时期前沿地位的强劲势头。作者指出：“有明一代，江西在科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不仅在数量上居于全国前列，而且质量上也相当突出。”可以说，与南直隶、浙江同居于前列地位。作者选取明代江西进士，作为区域性基础研究的对象，具有典型意义。作者又是江西人，在江西求学、工作，做此项研究又有地利、人和之便。

本书特点，首先是不厌其烦、深入地下功夫选取第一手科举文献资料，资料运用之精审、翔实、可靠，在同类研究中是佼佼者。试以明代江西进士总数研究为例，吴宣德《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》认为有2761人，郑建明《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》认为有3008人，谢宏维《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》认为有2728人，三者相差甚远，何故？他们在统计明代江西进士总数时，主要依据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《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·明洪武至崇祯附》，甚至依据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基本上都是根据第二手

资料。所以得出的结论既不统一，也难以令人信服。作者在书中指出，明代原始登科名录不全，别的不说，即如洪武十八年榜，《登科录》不传，进士题名碑被明成祖朱棣仆倒，《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·明洪武至崇祯附》只保存了293名。李周望据方志增补了21名，合计314名。朱保炯的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，在其增补的基础上，又据方志增补了108名，但仍缺少50名。几位研究明代江西进士总数的学者，没有先去解决这50名缺额，以及增补进士的真伪等问题，就凭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进行统计，能得出正确的数据吗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。作者就不绕开这一难题，而是深入挖掘和利用第一手科举文献，如《御制大诰三编》《明实录》《登科考》《贡举考》《类姓登科考》《弇山堂别集》《掖垣人鉴》《国榷》等，扎扎实实地对洪武十八年进士一一予以考证，全部考出了该榜472名进士，写成《洪武十八年榜进士考实》，发表在《文献》（2008年第1期）上。窥一斑可见全豹，其他考证不一一举例。这种严谨的考据贯穿全书，是本书的一大亮点。

正是在这样严谨考证的基础上，明代科举研究中的诸多重大问题，如明代贡士并非会试中式者，明代进士榜次和进士总数的确认，洪武十八年榜名单的是非，进士的更名改姓，考籍与乡贯的脱节，官年与实年的差异，等等，都在本书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，其结论令人信服。因此，本书的价值不仅限于考证江西进士，对于推进整个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，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。

本书第二个特点，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，去鉴别江西明代进士因地域流动、姓名变更及字号行用、文献记载的失误、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动等，造成进士一人变二人、籍贯歧异或张冠李戴等一系列问题。如康熙《江西通志》卷18《选举·进士·明》：“正统丙辰周旋榜 龙文，泰和人，官至侍郎……龙文，兴国人，官至南京工部侍郎。”据《通志》，龙文为二人同榜。《登科考》《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·明洪武至崇祯附》均作泰和县人，而嘉靖《赣州府志》、天启《赣州府志》，则作兴国县人。作者经过考证，认为龙文为一人，兴国县户籍，移居泰和县登进士。又如天启五年进士张斌，《类姓登

科考》有“姚张斌”，《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·明洪武至崇祯附》有“张斌”，这两者是否同一人呢？作者据崇祯《抚州府志》、雍正《江西通志》，理清了张斌原姓姚，临川人，登进士后复姓姚，但又保留曾改姓，故有双姓“姚张斌”之称，此称确使用于时，见雍正《广西通志》卷68《名宦·明》：“姚张斌，字宪卿，临川人，崇祯八年任苍梧道。”如此精细入微的考证，于当前信手拈引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《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·明洪武至崇祯附》等二手或常用文献资料进行区域进士研究风气，是重大冲击，也是一个重大突破。

本书第三个特点，是在严谨的史料鉴别与考订基础上，梳理出一份江西明代2719位进士的小传。其工作量至大，其功亦伟。这是一项研究江西明代进土地理分布、科举人物、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基础性成果，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。

作者与我师生相从三年，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，我又请他继续参与《中国历代登科总录》子项目《明代登科总录》的研究工作，因此一直保持着联系，关系良好。我对他的学术研究，十分信赖。一方面，他做学问，不好高骛远，能耐得住寂寞，刻苦好学，踏踏实实，严谨细致，一丝不苟。另一方面，他淡泊明志，为人忠实厚道，谦逊坦诚，不沽名钓誉，不搞旁门邪道，与势利之徒更是水火不容，是当代年轻知识分子的一根标杆。我和他在从事《明代登科总录》研究过程中，相互切磋，相互尊重，他重然诺，讲信用，合作得十分愉快。这在大型集体项目的分工合作中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格。

该博士论文在完成之后，因客观原因，迟迟未能出版。今年终于获得了出版机会，我为他高兴。他嘱我为之写序，我欣然命笔，遂写下了以上文字，权为之序。希望读者也能和我一样，分享这一可贵的研究成果，并从中得到为学的启迪。

杭师大特聘教授 浙江大学教授、博导 龚延明

2013年12月7日

## 前 言

一项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人才选拔制度——科举考试制度，一度只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存在于人们的认识当中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世界，真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一切人和物。对于科举制度，我们已将其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在批判的同时，开始了对其合理性内核的发掘。时至今日，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。

何忠礼教授对过去一个世纪的科举研究进行了综述。<sup>①</sup>他认为，这一期间科举研究的重要成果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科举制度起源问题，十余位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考辨，由于对确定科举制度的标准不统一，故未能达成一致；二是各朝科举制度的具体实施，包括科目设置、考试程序、考试内容、舞弊与防范、学校与科举、各朝制度的异同对比等诸多方面，都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，成果也最为丰富；三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评价及其国际影响；四是对古代科举史料的编纂，列举了三种最有影响的资料汇编。为作者直接引用的相关专著有四十余部，论文近八十篇，基本囊括了二十世纪较有影响力的论著，充分反映了过去科举研究的发展脉络，具有相当的深度。

刘海峰教授则从广的角度，对2005年8月以前几乎所有的“科

---

<sup>①</sup> 何忠礼：《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0年第6期，第142—155页。陈高华又补充了部分元代科举研究的著作，见《〈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〉的一点补充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1年第3期，第187—188页。



举学著作”进行了统计，其中甚至包括不少普及性的非学术作品，比如《科举奇闻》《状元趣谈》等。由此归纳出近二十个专论形式的科举学框架，包含了科举研究所能涉及的诸多领域，视野十分开阔。<sup>①</sup>

参照以上几位大家的研究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从朝代的取向来看，科举研究成果的分布并不均衡。对唐宋科举制度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，聚集的名家也最多，如傅璇琮、何忠礼、龚延明教授等；对清代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，如商衍鎰的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等。<sup>②</sup>相比之下，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比较薄弱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成果数量相对较少，除了政治制度、科举制度通史外，专门系统地研究明代一朝科举考试制度的专著，目前大陆仅见黄明光《明代科举制度研究》和王凯旋《明代科举制度考论》；二是成果质量还有待提高，不少著作对相关问题的论证不够细致，有些甚至还存在一定的观点性错误。

先拿上面列举的两本专著来说，作为目前国内仅见的两部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专著，作者的选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。在内容上，两书分别就相关问题开展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，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代科举制度的了解。不过，两书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，下面我们仅以两书对明代贡士的论述为例，稍微展开一点说。

黄著在第三章讨论明代会试情况及特点时，专辟一节论述会试贡士在政府衙门中的地位。<sup>③</sup>作者并没有对明代贡士的概念做出判定，但从其标题和正文内容看，显然是把贡士视为会试中式者的专称。从《明代登科录汇编》所记载的考官名单中，作者统计出33科会、殿试的考官有591人为贡士，然后依据这591位贡士的任职情况，得出了相关结论。我们认为，作者整个这一节的论证根本不能成立，因为他

① 刘海峰：《科举学导论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

② 以下在非引用时所提到的各书，版本请参见本书末参考文献，正文中不赘举。

③ 黄明光：《明代科举制度研究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62—63页。亦见于黄明光《明代会试初探》一文，载《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》1999年第4期，第63—65页。

连明代贡士的概念都弄错了。明人所称的贡士有多种含义<sup>①</sup>，既可以是贡生，也可以是举人；会试中式者当然可以叫贡士，但会试下第者同样可以称贡士。贡士被规定为会试中式者的专称乃在清代。那么明代《会试录》《登科录》中所载考官中的贡士，是不是会试中式者呢？试以其中《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会试录》为例，该科受卷官王聘为癸酉贡士，沙廷珪为壬午贡士，侯嘉祥为己卯贡士，林宗桂为乙酉贡士；弥封官魏琦为己卯贡士，夏时中为癸酉贡士，甘志道、张邦学为壬午贡士，等等。<sup>②</sup>明代的会试时间一般为辰、戌、丑、未年，但以上癸酉、壬午、己卯、乙酉等年均为乡试年，何来“会试贡士”？其实，这些“贡士”都是举人，明代俞宪早就说明了：“是年，礼部尚书称总提调兼知贡举，革掌行科举文字之称；执事官由举人者，改称贡士。”<sup>③</sup>

我们都知道，明代殿试只用以确定进士甲次，一般不存在黜落的问题，因此只要不出现意外情况，会试中式者都会参加本科殿试，获得出身。如果出现疾病、丁忧等特殊情况而不能如期殿试者，也可以参加下科甚至相隔好几科的殿试，然后出仕。<sup>④</sup>会试中式者不经殿试而去做官，不但未见载于史籍，亦不合于常理——有没有进士资格，对仕途发展的影响太大了，“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”<sup>⑤</sup>，谁会放弃唾手可得的功名利禄？黄明光对此没有留意，以致讨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。

王著在“科举三级考试探议”一章中直接引用了黄的结论，认为“科举会试后贡士的任官相对较低”，并且进一步阐述其原因是“明初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举行殿试，会试的结束也就意味着科举考试过

---

① 邱进春：《明代“贡士”小考》，《武汉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科学版）2006年第1期，第82—85页。

② 屈万里编：《明代登科录汇编》，《明代史籍汇刊》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，第5065—5068页。

③（明）俞宪：《皇明进士登科考》，《明代史籍汇刊》，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再版，影印明嘉靖增补本，第215页。

④ 钱茂伟：《国家·科举与社会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08—110页。

⑤（清）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，第1539页。

程的终结，正式的选官便已开始”<sup>①</sup>。这种解释实在是错上加错。所谓明初未行殿试，大概指的是自洪武四年（1371）殿试后，又同年、次年连举乡试，不经会试便直接授官<sup>②</sup>，洪武六年（1373）后暂停科举，直至洪武十七年（1384）又恢复科举。这段时间没有举行殿试，同样也没有举行会试，“会试的结束”云云实为不妥。即使贡士是会试中式者的专称，没有举行会试，又怎么会有中式的贡士呢？

与前二者相比，钱茂伟《国家·科举与社会》无疑是一部更见功力的著作。他从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的角度，对明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机制进行了阐释。该书理论建构与实证考据并重，以明代为切入点，实现了对古代科举社会的整体观照。龚延明教授评价其为“近年来涌现的研究中国科举的一部力作”<sup>③</sup>，其价值毋庸本文赘言。不过该书对明代科举制度的把握，依然存在一些小小的不足，诸如贡士之类的若干小问题，该书亦未详考<sup>④</sup>。以下补充谈明代进士观政制度中的一个问题。

《国家·科举与社会》中说，“哪些人指定到哪些部门实践的原则是什么？文献没有明确道明”，于是作者推测“大体按所治之经即同门集中原则”<sup>⑤</sup>。文献真的没有道明吗？《贡举考》卷1引《吏部职掌》云：“礼部咨送新科进士，其二甲、三甲者，吏部具题照依钦定二甲从七品、三甲正八品支俸，拨各衙门办事，照依名序，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、都察院各二员，通政司大理寺各一员，周而复始，榜末十余员俱留吏部。”<sup>⑥</sup>把这个挑选原则说得清清楚楚。潘星辉《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》中也引用了这则材料，但并没有作实证性

① 王凯旋：《明代科举制度考论》，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97页。

②（明）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标点本，第421页。

③ 钱茂伟：《国家·科举与社会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，封底。

④ 邱进春：《科举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》，《中国图书评论》2005年第9期，第40—41页。

⑤ 钱茂伟：《国家·科举与社会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17页。

⑥（明）张朝瑞：《皇明贡举考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，史部第269册，第51页。

说明。<sup>①</sup> 为了验证，本文特意选取《嘉靖丙辰（1556）同年世讲录》，制作了一个表格（见正文末附表1），考察该科每位进士的甲次、观政部门和所习经书之间的关系。从这个表格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尽管不是特别严格（或许是个别调整），但这个原则还是基本得到遵行：观政部门只依照进士的殿试名次分拨，与所习经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

由此可见，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。产生问题的根源，可能还是忽视了对原始文献的深入发掘。或许大家都以为明代科举制度与清代完全相同，参照清代的相关论著，既省时又省力，没有必要对浩如烟海的明代文献进行深究。下面这种研究现象，更能反映出忽视原始文献的严重性。

对进士进行统计分析，是近年来涌现的一个研究热点，与明代相关的论文十余篇，一些专著也辟有专门章节。论文中影响较大的有沈登苗《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》、范金民《明清江南进士数量、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》、谢宏维《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》、郑建明《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》、吴宣德《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》等。<sup>②</sup> 专著见何炳棣《明清社会史论》（*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*）、吴宣德《中国教育制度通史·明代卷》、多洛肯《明代福建进士研究》（多洛肯的另一专著《明代浙江进士研究》对其数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）、方志远《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》等。以上论著通过对明代进士的量化统计，对明代进士在各地域的分布规律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，从科举的角度描述了明代的社会生活状况，不失为一种很有价值

① 潘星辉：《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

② 沈登苗《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》，载《中国文化研究》1999年冬之卷，第59—66页；范金民《明清江南进士数量、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》，载《南京大学学报》（哲社版）1997年第2期，第171—178页；谢宏维《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》作24898人，见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》（哲社版）2000年第4期，第23—28页；郑建明《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》，载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99年第4期，第205—226页；吴宣德《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》，载《教育学报》2005年第1期，第76—88页。

的研究。

但是，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原始文献，仅凭借索引性工具书或其他二手资料，又缺乏必要的考证，致使大多数的研究结果相互矛盾，造成相当混乱的局面。

第一，对明代进士总数的统计数字不一（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）。何炳棣、范金民、沈登苗、吴宣德等学者都对明代进士的总数作了统计，所得数据最大者为谢宏维的 24898 人，最小者为黄明光的 24452 人，相差 446 人。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，除了技术操作上的误差外，与各自采用的原始资料不同有密切关系。他们有的选择方志，有的选择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更多的选择是《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·明洪武至崇祯附》（以下简称《碑录》），以及据此编成的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（下称《索引》）。这些资料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包括对明代进士总数的记载，或漏或增或误，不一而足。

第二，各地区的分布统计数据不一。比如江西地区的明代进士，就有不同的数字。吴宣德认为有 2761 人，郑建明却认为有 3008 人（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），差距十分明显。再细到各府县，同样各有各的数字。

以上学者在作统计时，基本都是将二手资料视为原始资料，未加考证便直接利用。作为当前学者使用最多的工具书，朱保炯、谢沛霖编的《索引》是“把清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所刊行的《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》及其所附刊明代诸科，以《进士题名碑》的拓片、《登科录》、各省方志等校订增补，重行汇辑，并加以索引化”<sup>①</sup>，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利用，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的索引书。从统计的角度出发，只要将《索引》完整地输入电脑，稍加编辑，即可得到一系列的数据。从技术层面看，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，数据的正确与否，取决于资料的可靠程度，如果《索引》真的利用《登科录》等资料完成了对明代进士的必要考证，那么从其得到数据当然真实可信。可惜的是，《索引》虽然进行了校订增补，比如对洪武十八年

<sup>①</sup> 朱保炯等：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·前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。

(1385)科进士的增补等,但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,甚至还存在不少错误的考证。编者的确对《登科录》等原始材料加以利用了,但从其内容来看,实在有限得很。而且,在进行编排的时候,也存在不少诸如漏载、重出、错字、错甲次等种种疏误。因此,把《索引》当作统计的原始资料,是值得商榷的。其他几种资料同样存在问题,均有待必要的考证。除此以外,大家对明代进士的籍贯判定标准存在差异,有的以其户籍所在地为统计源,有的则以其乡贯为统计源,这也是导致分区统计数据不一的重要原因。

统计数字的精确是量化研究的追求目标,如果原始数据就存在大量错误,又怎能做出精确的统计?由此可见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性。依照现今的研究水平,我们完全可以进行系统的整理,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。但到目前为止,专门对明代科举文献进行研究的论著极少。陈长文在这方面下力较深,其初有《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〉校误》一文<sup>①</sup>,这是国内第一篇专门给《索引》挑错的论文;后又以《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》作为博士论文,对明代科举研究的最可靠文献——《登科录》进行了全面的剖析,为我们合理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。毛晓阳、马怀云亦有专文对《索引》进行订正。<sup>②</sup>钱茂伟对明代科举名录的编纂也作过探讨,但重在介绍。多洛肯亦对此有过阐述,但他在《明代福建进士研究》和《明代浙江进士研究》中,似乎并没有充分体现出其对各种文献进行的整理工作。

随着科举研究的深入,对最为基础性的各朝进士名录进行充分的考证和统计,已经成了一项十分必要而紧迫的任务。于此,我们不能不提及龚延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中国历代登科总录》。该大课题组依照朝代细分,组织了几个子课题组,广泛收集了国内外各种科举文献,在进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,力求对每一位进士的字

---

① 陈长文:《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〉校误》,《开封教育学院学报》2001年第2期,第13—16页。

② 毛晓阳:《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〉进士籍贯刊误述论》,《中国文化研究》2005年秋之卷,第43—52页;马怀云:《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〉订正》,《河南大学学报》(社科版)2004年第6期,封三。

号、籍贯、甲次、历官及生卒年等情况做出准确的考证。其学术价值之高，是不言而喻的。课题组成员祖慧教授应邀去日本访学时，曾专门向日本学者介绍了该课题的进展情况；龚延明教授亦在2005年科举研究国际研讨会（厦门）上作过《中国历代登科总录》编纂情况的介绍，引起了海内外学者较大的关注。

这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巨大工程，其中的任何一个朝代，都不是某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得了的。其中明清进士为数众多，分省、分专题进行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。多洛肯《明代福建进士研究》和《明代浙江进士研究》、蒋金星《清代硃卷集成文献价值研究》、毛晓阳《清代江西进士丛考》以及陈长文《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》等博士学位论文，都源出于该课题。他们分别选取不同的角度，为《中国历代登科总录》之子课题《明清登科录》进行了部分最基本的文献考据工作。笔者这篇博士学位论文，也与此课题紧密相连。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，章培恒先生曾指出，“这种区域性的断代研究实在是当务之急；只有这样的成果积累得多了，我们才有可能对科举制度开展较为全面的断代研究”<sup>①</sup>。

本文选择明代江西进士<sup>②</sup>作为研究范围，主要是考虑到，有明一代，江西在科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不仅在数量上居于全国前列，而且质量上也相当突出。明代江西进士中，名登巍科者甚众，乃至有一科鼎甲全为江西者。比如建文二年（1400）榜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、传胪全是江西人；下科永乐二年（1404）榜，江西人又一次囊括了三鼎甲，而且二甲前12名中，仅有第5—7名旁落外省。如此盛况，在明代是绝无仅有！下表对巍科<sup>③</sup>人数的统计，基本能反映出江西在明代科举中的重要地位：

① 多洛肯：《明代浙江进士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3页。

② 按：本书所考证的明代江西进士定义从宽，凡户籍或乡贯为江西（明代江西布政使司所辖地区，不含婺源县）者，均予以收入，后文在统计时作了说明；本书所指进士，均不含武进士。

③ 明人所谓的“巍科”，其实范围比较广泛，凡二甲前列者亦可称之，此处特借指表中所列5类杰出者。

明代巍科地区分布表

单位：人

省名	状元	榜眼	探花	传胪 <sup>①</sup>	会元	合计
合计	89	89	89	89	89	445
南直隶	22.5	18.5	23	16.5	29	109.5
浙 江	19.5	18.5	15	15.5	19	87.5
江 西	17	17	22	23.5	16	95.5
福 建	11	12	10	9	8.5	50.5
北直隶	4	7	3	5.5	2.5	22
山 东	4	1.5	2.5	3	1	12
湖 广	3	2	3	5	5	18
广 东	3	2	2	3	4	14
河 南	2	2.5	0.5	2	1	8
陕 西	2	2	3	1	3	11
四 川	1	3	2	2.5	0	8.5
山 西	0	2	2	2	0	6
广 西	0	1	1	0	0	2
云 南	0	0	0	0.5	0	0.5
贵 州	0	0	0	0	0	0

说明：本表据明各榜《登科录》《进士履历便览》《明实录》《登科考》《皇明三元考》《国朝典汇》和《碑录》《索引》等综合而成，对于户籍和乡贯不在同省者，两省各计0.5，既便于统计，亦可避免不必要的争执<sup>②</sup>。另，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会元沈同和因舞弊被除名，但此统计含。

从表中可见，江西在各项指标上都居于全国的前列，其中在巍科总数、探花等项上还超过了浙江，仅落后南直隶数人。江西进士在仕途上也有不凡的表现，官至首辅、尚书等显宦者大有其人。据《新知录摘抄》载：

江西一省，可谓冠裳文物之盛，而吉安一府为尤最。自洪武

<sup>①</sup> 《明史》卷70《选举二》谓俗以“二、三甲第一为传胪云”（第1693页），考虑到三甲第一名的实际影响力并不突出，本表仅统计二甲第一名者。

<sup>②</sup> 多洛肯亦有《明代巍科人物的各直省分布统计表》，但他对籍贯的确定没有说明，故其表数字与本表稍有差异，见《明代浙江进士研究》，第162页。



辛亥至嘉靖己未（1559）凡六十科，吉安进士七百八十八人，状元十一人，榜眼十一人，探花十人；会元八人，解元三十九人（登第者二十八人）。官至内阁九人；一品六人，赠三人；尚书二十二人，赠四人；左、右都御史六人；得谥二十五人。<sup>①</sup>

因此，在明代进士中，江西进士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，由此也成为《中国历代登科总录》之子课题《明代登科总录》的研究重点之一。

本书的研究过程：第一步，从《索引》中抽出籍贯为江西的进士名录，依照榜次先后排序列表，作为校勘的底本。第二步，用《碑录》作对校，初步发现《索引》存在的问题。第三步，用各榜《登科录》《进士履历》或《同年序齿录》等对校，同时制作进士小传，凡《索引》《碑录》与之相矛盾者，以《登科录》等为准；《索引》《碑录》缺载原籍者，概依《登科录》补入。第四步，对于无《登科录》可资利用的科次，以《皇明进士登科考》（以下简称《登科考》）、《皇明贡举考》（以下称《贡举考》）等对校。第五步，用地方志作对校，补充进士人物小传。最后形成《明代江西进士小传》和明代江西进士分榜分区统计表（见附录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凡是各进士名录不能相互印证处，尽可能利用《明实录》《献徵录》《明史》《国榷》等传记资料加以考证，最大限度地保证考证结果的可信度。

本书结构安排如下：正文的开头，先对记载明代江西进士的文献进行分析，比较各种文献之间的异同，并对其存在的问题加以揭示。其次，对明代全国进士的总数及各科人数进行考证，以之为江西进士的参照系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江西在明代科举中的位置。然后对明代江西进士总数、时空分布进行统计，总结其变化规律和原因。本来还应该把江西与其他直省作一比较，但经慎重考虑，还是觉得不作此比较为好——尽管目前有不少学者对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研

<sup>①</sup>（明）刘仕义：《新知录摘抄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，第2928册，第72—73页。